

口述：徐小岳 | 26岁 | 乡镇干部 | 湖北
整理：陈国洲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婧宇

在专为滞留重庆的湖北人提供的集中隔离观察点，我和老公盯着早孕测试纸上的结果，反复确认自己怀孕后，突然释然了。

此前，连续几天做了多次测试，也都是这个结果。与其说是怀疑测试结果准确性，不如说是实在不敢相信，宝宝会来得如此“特别”！

这一路，先是出国度蜜月的甜蜜，突然陷入有家难回的焦虑，紧接着又被集中隔离观察。如果从出国之日起计算，我们整个隔离期都在蜜月里。

正当我抑郁不已，准备打心理咨询电话时，却发现自己怀孕了！

我是1993年出生的，老公周非凡比我小一岁。我俩都是湖北恩施的乡镇干部，来自最基层。

从去年11月举办婚礼后，我就盼着赶快过年，好开始欧洲蜜月之旅。

1月18日，拿着厚厚的旅游攻略，我俩满怀憧憬地出了门。因为恩施离重庆近，坐动车只要两个半小时，我们就报了从重庆出发的旅行团。

当时，有关新冠肺炎的报道并不多，周围好像也没人谈论。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年，乡里年味更浓，我妈还在催我，初五回来早点回娘家。

蜜月旅行前半程，和我设想的一样美好，逛巴黎香榭丽舍精美的橱窗，喝德国正宗的黑啤，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意大利……

正美着呢，国内疫情的报道开始占据网络，让大家感受到了气氛异常。导游开始每天给我们测体温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看见阳光照在我老公的脸上，他还拿着试纸在傻傻地笑。我长长舒了口气，回想之前我的种种焦虑不安，抑郁自责，好像都有了解释，情绪的波动肯定是这个小家伙带来的

听说国内“一罩难求”，大家要求导游带着抢购口罩。地接导游索性自己兜售了：一个普通口罩1欧元。我俩认识不是很到位，竟然嫌贵只买了7个。

除夕那天，我俩又都接到单位通知，要求所有干部一律停止休假，立即返岗。

我开始担心返程的问题了。旅行团不能提前返回，我俩干着急，后面的行程自然兴致大减。

直到1月29日飞机降落重庆，我才真正明白：之前的焦虑都是小儿科，形势比我们的想象更严峻。

凌晨4点50分，我们搭乘的航班一落地，乘务员就开始广播点名，要求被点到名字的乘客先下飞机。我俩下来后才反应过来，点名的都是湖北籍乘客。

同行的有6个武汉人，被送去采血测试，我们其他人经过了医生量体温、询问等程序后，顺利通关。

家也回不去了，出了机场直奔重庆北站，发现所有开往湖北的列车，都停运了，班车也停了。突然没了方向，心里莫名慌张和委屈。

我们在网上迅速订了一家位于重庆渝中区的宾馆。到达后，一出示身份证件，前台小姐姐忙摆手拒绝，好不容易说通了让我们住下。没多久，老板又找来了，要求我们离开。

我委屈极了，报了警。警察态度挺好，劝了我们半天，还告诉我们政府为滞留的湖北籍旅客，专门安排了临时安置点。按照警察叔叔的指点，我们来到了位于渝中区白象街的安置点。

集中隔离生活，接着蜜月开始了。宾馆是三星级，条件挺好，最让我感到温馨的，是这里的饭菜——地道的重庆烧白、酥肉、牛蛙、兔头……每顿两荤两素，两个多星期，我俩都吃胖了。

我们需要什么生活用品，都可以在群里说一声，工作人员代购后送到门口。

每天早上，下午各量一次体温。我们住进来的第三天，就采集了血样和咽拭子。

当时隔离点住着63人，都是老乡，没事大家就会在群里聊。说得更多的是，重庆有什么好吃的，好玩的，大家心情放松了不少。

一次有人说，这次来重庆旅游，心心念念惦记的重庆火锅，至今都没吃上呢。大家纷纷赞同。没想到隔离点的负责人王亚非“冒泡”说，“那改天大家就整火锅”！

起初，大家就当开玩笑，没想到过了几天，还真送来了！每个房间一个热腾腾的便携式火锅，把大家感动得想哭。

原来，工作人员联系了重庆市火锅协会。一听隔离点的湖北兄弟想吃火锅，他们立即免费送来一批火锅底料和菜，由工作人员在食堂煮好后，给每位隔离客人送到房间。

群里有两位老人说，胰岛素要用完了，这是处方药，药店买不着。隔离点的工作人员不知想了什么办法，买来了；群里有初中生在上课了，没教材，工作人员又给弄来了……

不过，每天对着不大的窗户发呆，特别是想到同事们这会儿都在忙，我却被困在这里，就开始自责，有时候都难过得想哭。

我老公反复做思想工作，我才同意他给隔离点的心理咨询热线打电话。虽有一定作用，但不能“痊愈”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有一段时间没来例假了，猜想自己是不是怀孕了？私信了隔离点的工作人员，托人家给我买早孕测试纸。

这天是2月14日，情人节。连日阴雨的重庆，竟然难得地出了会儿太阳。

我趴在床上，看见阳光照在我老公的脸上，他还拿着试纸在傻傻地笑。

我长长舒了口气，回想之前我的种种焦虑不安，抑郁自责，好像都有了解释，情绪的波动肯定是这个小家伙带来的。

当时，单位通知无法返回的干部，可以自愿就近参加当地防疫工作。这启发了我，干脆就在隔离点做志愿者吧。

我们这个隔离点有100多名工作人员，包括医生、警察、社区工作者……如果我们还在恩施，干的也是类似工作。

老公完全赞同我的想法，我们立即跟这里的负责人王亚非说了。没多久，他通知我们很高兴接收两个“新兵”。

很快，我俩隔离观察期满，身体指标合格可以外出了。2月15日，王亚非给我们送来了口罩、防护服、护目镜，我们负责为隔离点的住客们送餐。

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工作，但我干得很认真，尽量快速地把饭送到大家家门口。

现在我的心情很平和，闲下来就愿意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说话。我在想，等宝宝出生长大了，得给小家伙好好讲讲这段奇特的经历。



▲3月1日，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分娩室，产妇刘婷和助产士吴丹（右一）、夏雪合影，并为志愿者和医护人员点赞加油。

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“疫线”分娩，医生与产妇成姐妹

口述：席和红 | 44岁 | 医生 | 四川
整理：吴光于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黄海波

2018年6月，我被单位选派到凉山州下面一个叫绵垭村的地方，成了一名村医。

在大凉山扶贫这一年半，每两个月可以回一次家。路很远，单程至少要折腾整整两天，遇到堵车就说不准了。

我女儿今年15岁，正在读初三，是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。我这当妈的心里，一直觉得挺亏欠她。

去年底，当地迎接扶贫验收。我一直抽不开身，3个月没回过家。

直到今年1月10日，女儿学校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家长会，爱人去外省出差了，我只好给乡里申请，提前回了老家蓬安。

本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美好的假期，没想到疫情蔓延这么快。

蓬安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，有不少人在湖北打工、做生意。联想到当年的“非典”，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

很快，县里就有了确诊病例，好些同事写请战书。

1月24日，我接到凉山方面的通知，那边也有确诊病例，外地扶贫干部暂缓返岗。我当产科医生20年了，去扶贫之前是我们县妇幼保健院的业务骨干。疫情时期回不了凉山，又不想闲着，于是我也向医院请战。

2月1日，院长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位正在

当了20年妇产科医生，从来没有哪一位孕妇，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

隔离观察期的孕妇，急需陪护。

孕妇的哥哥从武汉回来，和她在一个屋檐下待了4天。1月27日，哥哥感到身体不适，3天后确诊为新冠肺炎。

当时孕妇已经38周多了，临产在即。我们医院立刻组织了一个医疗团队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儿科、内科、手术室、麻醉科、检验科等十几个人。

当了20年妇产科医生，从来没有哪一位孕妇，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。

组队完毕，我们坐上救护车直奔她家。由于孕妇属于密切接触者，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——穿着防护服，戴着护目镜和口罩。

看到我们这个阵仗，她老公不太高兴，觉得我们太夸张了。

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更是对这个小县城里的其他孕产妇负责。如果我们不幸被感染，那些孕产妇们如何就医？

第一次见到这个孕妇，感觉她浑身上下都透着焦虑——眉头紧锁，一直问我，如果她被感染，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事。

她今年32岁，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宝宝，这是她的第二胎。

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们不希望最坏的结果发生，但如果真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也有预案应对。

那天，我一直向她保证，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保她母婴平安。

当天的产检，体温、血压、脉搏、胎心一切正常，大家暂时松了口气。

离开她家前，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，随时跟踪她的情况。胎动如何、饮食如何、睡眠如何……说实话，我自己生孩子都没这么细致过。

2月8号，第二次到她家里去做产检。这一次，她老公的态度热情了许多。这时，离预产期只有5天，为了保证母婴安全，我们决定把她接到医院。

医院把体检区改成了独立分娩区，并把她的儿子和丈夫，也接过来陪伴她。

2月13号，胎儿已经足月了。我们每天都做胎监，与川北医学院专家随时沟通情况。

考虑到她不能排除隐形感染，为了将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，我们劝她说做剖宫产。但遭到了她和家人的坚决反对。

于是，我们整个团队又进行评估，和专家反复讨论，最终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。

2月17日，孕妇有了宫缩。第二天中午，宫缩的频率达到每20分钟一次。

我们又进行了全院会诊，考虑到她还有频发室性早搏，我们担心生产过程太长，会增加危险性，建议她使用缩宫素催生。这次，她和我

属很快同意了。

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甚至准备了除颤仪。

下午5点40分，产妇上了产床。整个生产的过程，我都在她的身边。产房里的3名护士，一直在给她加油打气。

产妇表现得非常棒，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指令，调整着呼吸和用力。

她在产床上满头大汗，我在防护服里全身湿透。

这个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忍受着分娩的痛苦，拼命把她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。

38分钟后，一个6斤8两重的女婴呱呱坠地了。

手捧着这个特殊时期降生的婴儿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，护目镜上起了一团白雾，视线变得模糊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产妇开始大出血，10分钟失血量达到了800毫升，我们立即进行药物处理和子宫按压。

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，产妇才脱离危险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，我们又给这一家人做了新冠肺炎检查，再次确认他们一切正常，安然无恙。

这一路走来，这位妈妈已经成了我的家人，像一个妹妹，也像一个战友。

在疫情面前，我们虽然是医生与病人，但也是彼此的陪伴，一起走过了这20天的艰难时光，这将是我从医生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。

口述：王季娅 | 29岁 | 湖北
整理：刘荒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婧宇

2月4日，农历立春，本该是万物复苏的时节，可笼罩在疫情下的武汉，却让人觉得毫无生机。

这天，女儿的诞生，给我们全家增添了喜庆的氛围，也释放了一下这些天高度紧张的心情。

时光回溯十个月，若我有先知的本领，绝不会选择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，迎接我可爱的小公主。但这也正如母亲所言，生老病死，是谁都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。

1月17日是腊月廿三，阖家团圆的小年。我们一大早就来贴了春联，随着拥挤的人潮置办了年货，还买了心仪的年宵花。我们早已习惯赶在过年之前，将家里装扮一新了。

我还腆着肚子跟老公开玩笑：“下次来花市，我就不是只大企鹅了。”现在想来，无比庆幸自己那时考虑到孕妇抵抗力差，戴了一个N95口罩……

早在两天前，我就让爸妈带着大宝，回了老家潜江。我和老公留在武汉，等候二宝这个新生命的降临。

那时的武汉，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。远在上海的亲戚，每天都会把他们听到的消息告诉我。现在想起来，似乎真应了那句话：全国人民都知道武汉疫情很严重，武汉人民还沉浸在过年的欢天喜地中。

1月22日，腊月二十八，是我常规产检的日子。一直负责我孕期管理的医生告诉我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先别来医院了。

此时，钟南山院士已发出“没有特殊原因，大家不要前往武汉”的提醒。与平日相比，武汉的人流、车流明显减少了。

说不恐慌，那是安慰自己的。除了医生的叮嘱，我每天微信里都会收到来自天南海北的问候。

我能感受到，这些朋友尽可能地不让我产生恐慌和忧虑，但却又实实在在地替我担心。

而我只能尽可能地宽慰自己，让亲朋好友们感受到我的乐观与积极。我们又买了两盒在当时还没断货的口罩，以及一些消毒工具……

1月22日晚，传来了武汉“封城”的消息。我连夜与父母通话，商量他们是否来汉。

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，看到通知的第一时间，他们就已经决定：母亲独自带着大宝自驾返汉。而他是一名扶贫干部，必须听从统一安排，留在抗疫第一线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一宿未眠，顶着两个黑眼圈的我，终于等来了母亲和大宝的归来。

母亲说，她不来，怕我月子都坐不圆满……也许只有身为人母，才更能感受到母爱的伟大。

从这天开始，我们全家进入自我隔离状态。母亲从老家带来的口粮，足够家里撑一阵子的。我们坚决服从安排，能不出门绝不出门，静静等待这个小生命的降临。

唯一让我们担心的，是在抗疫第一线的父亲。我用严厉的口吻叮嘱他，每天中午和傍晚，必须跟家里视频通话。这也是我们父女之间习惯了的相处模式。

父亲每天会在视频里，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，他一天都做了些什么。诸如他开着车在村里拿着大喇叭，宣传要戴口罩、勤消毒；守在村口不让本村村民外出，不让外村村民进入；村里有一户村民发热，谁都没有打扰，自己让家人开车去了医院，全家已被隔离。

父亲尽可能不让我们担心，我猜更多是为了我产前情绪稳定，而我却从他的描述中，切切实实感受到疫情日趋严重。

终于有一天，父亲打来电话时，特别生气：“一个老大妈非要出去买菜，我不让她出去，她骂我断子绝孙！”

我知道，这触碰到了父亲的底线，他是真的生气了。做扶贫干部三年多，他没少挨骂，也没少受委屈。换位以往，他总是能一笑而过。

在我临产前这个关键时候，被人家这样咒骂，他确实是怒了——这时，我已超过预产期4天了。

立春前一天晚上，我突然腹痛难忍。我知道，二宝要来了！经过一夜的努力，2月4日，二宝降临人间。

这天立春，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第一批病患。躺在产床上，我给家人发了一条微信，给“二宝取名‘楚烨’”，意思是荆楚大地，火种升华。

我相信，立春之后，一切向好。很多人告诉我，在这个时候听到新生命降临的好消息，振奋人心。

还在恢复期的我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于是，写下了一篇经验贴，发在了APP上，供即将生产的孕妈们借鉴参考。

而现在，我最想跟所有人说，要用乐观的心态，迎接生命里的挑战，再困难的日子也能看到希望。

从疫情防控开始到现在，已经快一个月没能和父亲面对面聊天了。父亲也只能从视频里，看看自己盼了好久的孙女。

我特别想借《目送》中的一句话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——“幸福就是，早上挥手说‘再见’的人，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。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，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。”

你要问我有什么心愿，我就盼疫情早日结束，能早一天看到我的爸爸……

春天里迎来了新生儿「楚烨」